

從蘇聯農長易人說起

鄒宇光

壹 經濟上最尖銳的挑戰

一九七三年二月三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發佈命令，解除現任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波里安斯基和農業部部長馬特克維奇的職務，同時任命前者接任農業部部長，後者另有任用，但是未見下文。

這是近年來蘇聯政壇上一件相當重要的人事更動，其意義非同小可。部長會議係蘇聯的最高行政機關，綜管全國政務，設主席一人，自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四日黑魯曉夫垮台後，十五日便由柯錫金接任到現在，為時將近八年半之久，其下設第一副主席兩人，副主席九人。兩名第一副主席中，一是綜合主管工業部門的馬祖洛夫，另一名就是主管農業——這次被調動的波里安斯基——也是被認為最幹練的行政人才。這兩員蘇共政要，雖然非頂尖人物，但是在高階層中也頗熠熠有光，不是等閒之輩，如果加以比較比較的話，實在難分軒輊：

姓	名	馬祖洛夫	波里安斯基
籍	貫	白俄羅斯	烏克蘭
年	齡	六十	五十七
學	歷	高級黨校、公路技術學校	農業專科學校及高級黨校
黨	齡	三十四年	三十五年
中	任	十七年	十七年
委	任	十六年	十七年
現	任	一九六五	一九六五
開	職	三、廿六	十、二

這兩個人對於柯錫金來說，有如左右手，茲值蘇聯遭遇另一次農業危機之際，調用其中之一，而且貶任為部長，自有其不得已難言之隱，但是這樣

從蘇聯農長易人說起

一來，是否就有補時艱，能够協助蘇共渡過這個危機，苟延柯錫金八年多來所高踞的部長會議主席位置，而維持其政治生命呢？這些問題，不是三言兩語可以答覆，不過西方記者，使用一句話形容，似乎頗為適切，那就是：『經濟上最尖銳的挑戰。』

貳 波里安斯基的底細

波里安斯基係一九一七年出生於烏克蘭地方的斯拉夫雅諾塞爾斯克城。一九三九年才加入共產黨，那一年他畢業於卡爾科夫的農業專科學校，他在此之前，曾在共青團中工作及任國營農場工人。一九三九——四〇間，擔任卡爾科夫共青團的組長。一九四〇年加入紅軍。一九四二年畢業於聯共中央高級黨務學校，其後歷任新西伯利亞州某地區的第一書記，克里米亞州黨部第一書記，克拉斯諾雅爾斯克邊區黨部第一書記等職。黑魯曉夫主政時被擢為俄羅斯聯邦共和國的部長會議主席，及聯共中央俄羅斯局的委員，一躍而為蘇聯政要矣。繼而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四升任為全蘇聯部長會議的副主席。在聯共中央中，波里安斯基在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至二十五日召開的聯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中，當選為中央委員，其後一直蟬聯至今。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朱可夫元帥被逐出聯共中央主席團時，他獲得黑魯曉夫青睞，被拔擢繼任。一九五八年九月的中央全會，他和包戈尼同時被選為聯共中央主席團的候補委員，那時候，柯錫金、馬祖洛夫、基里千科等人都是那十名候補委員中的一名。一九六〇年五月聯共中央全會中增加了三名中央主席團委員，其中一名是波里安斯基，另外兩名，一是柯錫金，一是包戈尼。值得注意的，馬祖洛夫那時候却還是主席團中七名候補委員之一。

波里安斯基自從一九五四年以後，歷次均當選最高蘇維埃代表，曾任法案委員會主席，憲法委員會委員，一九六〇年曾訪問美國，一九六五年擔任訪問阿富汗代表團團長，一九六六年曾訪問加拿大。並先後獲得三次列寧勳章。

叁 馬特克維奇亦非弱者

至於被免職的原任農長馬特克維奇，雖然未見下文，但在蘇聯政壇上，尤其是農業方面，亦非弱者。

自從一九四七年二月四日至一九七三年二月三日為止，二十六年以來蘇聯的農業部長，曾經過下列九次的更調。

任別	姓 名	任命日期	卸任日期	備 考
第一任	貝尼吉克托夫	一九四七、二、四	一九五三、三、五	任期六年一個月一天
第二任	貝尼吉克托夫	一九五三、三、六	一九五三、三、十五	九天
第三任	貝尼吉克托夫	一九五三、十一、廿六	一九五五、十、十七	(1) 一年九個月二十一天 (2) 一九五五、三、二日至一九五七、五、卅日止同時兼任國營農場部部長職
第四任	馬特克維奇	一九五五、十、十四	一九六〇、十二、廿九	五年二個月十九天
第五任	奧爾珊斯基	一九六〇、十二、廿九	一九六二、四、廿五	一年三個月廿四天
第六任	佩 辛	一九六二、四、廿五	一九六三、三、八	十一個月十三天
第七任	伏洛夫遷科	一九六三、三、八	一九六五、二、十七	一年十一個月九天
第八任	馬特克維奇	一九六五、二、十七	一九七三、二、三	八年零半個月
第九任	波里安斯基	一九七三、二、三		

上述歷任農長中，最後一名係新任，不擬列論，其他各員，實際上只有五名，其中兩名係重複或連任者，即貝尼吉克托夫，曾連任三次之多，計時共七年十個月之久，馬特克維奇則曾復任一次，但是前後合計，其担任農業部長時間則在十三年三個月以上。可以說，係蘇聯二十六年來任期最長的一員。

貝尼吉克托夫在一九六〇年出使南斯拉夫，其後調駐印度。馬特克維奇則始終在農業工作崗位上服務。他出生於一九〇九年在烏克蘭的查波羅什地方，一九三二年畢業於卡爾科夫生物專科學校，一九三九年才參加共產黨，

一九三九——四一年及一九四三——四六年兩度出任其母校校長。一九四六年起從政，歷任烏克蘭共和國之農業部次長、農長及烏克蘭部長會議之第一副主席，為黑魯曉夫賞識於一九五三年調升全蘇農業部第一副部長，並曾先後担任訪問美、加拿大，英國之農業代表團團長及黑魯認為最得意之處女地開墾委員會主席（時在一九六〇——一九六五年）。其間曾隨同黑魯曉夫訪問美加兩國，並發表：『我在美加所見到的』一書。但是黑魯曉夫在職前，却被調任哈薩克地方主持農業開發，並兼任哈薩克共和國共產黨中央主席團委員，他曾先後獲得二次列寧勳章，勞動紅旗勳章，綜觀其一生，對於蘇聯農業的改進、發展，貢獻頗多，這一次被貶，真正原因不明，判斷自然和一九七二年度蘇聯穀物收成不佳，造成農業危機有關。嚴格說來，馬特克維奇雖然身為農業部長，且前後達十三年之久，自然不無責任，而接任的波里安斯基是直接主管的上級負責人，照理，應該担负更多的咎失；也許就因為這個緣故，貶謫現職。值得我們探討的問題，也就在此。

肆 蘇聯農業危機史的回溯

縱觀多少世紀以來，饑饉已成為俄羅斯人民習見的災難。自從一九一七年俄共竊奪政權，厲行共產暴政以後，更變本加厲。一九二一年——二二年間，伏爾加河沿岸乾旱為甚，死於災荒和暴政之下的生靈，達五百二十萬人之多。一九二八——二九年強迫施行農業集體化，接着一九三二——三三年又逢旱災，政府收購穀物，農民怠工，再度造成饑饉。一九三八年許多地區曾遭遇一百五十年來所未有的旱乾，幸而當時農業已有改進，而渡過了那次的災厄。

史達林統治年代，暴政頻施，罪孽滔天，一九六四年二月聯共中央全會上，黑魯曉夫曾有一篇報告，批判史達林對農業方面所犯的一連串錯誤，主要的有下列三點：（一）把集體農場的所得稅提高到四百億盧布，而當時集體農場整個收入才不過四百二十億。（二）使用戶口身份證代替勞動身份證，而列寧是贊成後者的。（三）史達林死前不久，提議取消國營農場制度，把土地移交給集體農場（註一）。

史達林未死之前，大概在一九四七年間已發現飢荒的情事。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八日起緊頒佈改進農業生產的三年計劃，把一項龐大無比耗費巨資人

力物力的改造自然計劃也停擺下來。一九五〇年是蘇聯農業政策上一個急劇改變的年代——就是合併小農場為大規模的農場。這一個政策的着眼，却並不完全基於農業的需求，而兼有工業、國防、勞力運用、行政管理，甚至如何加強控制人民反政府可能的發生等的用意存焉。

一九五三年史達林死亡後，政局動盪，不久貝里耶遭到整肅，其罪狀之一便是他的農業政策，使集體農場的生產低落和造成糧荒，工業原料缺乏等等。馬連可夫接長部長會議主席以後，致力於改進農業，向國外購進消費品，價值達美金兩億五千萬美元，一九五四年國家預算中，農業部門比上一年度增列百分之四十二、四之多，特別重視農情報導，舉行大規模農業展覽會，頒發了四萬枚農業英雄獎章和許多獎品，總算是渡過一次『糧食陣線』上的危機，而延續其統治到一九五五年二月。

黑魯曉夫執政後，平心而論，相當重視農業的發展，其主要措施，包括恢復對農民的物質刺激，加強對農業領導的機構和幹部，推廣科學、技術成果，先進經驗應用於農業方面的改良，發起東部墾荒運動，這些對於當時農業生產情況的好轉，的確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後來由於黑魯曉夫一連串野心太大的經濟計劃的結果，經濟生長率遲緩下來，而且低到祇有百分之二·五，一九六二年整個蘇聯的農業生產量降低到百分之四，一九六三年依然是這個數字，降低了百分之四，造成情況最嚴重的一年——一九六四年，黑魯曉夫也因這個原因之一而垮台了。

一九六五年九月聯共中央全會上作了一次歷史性的決定，所謂邁向共產主義社會建設的一新階段，徹底改革經濟管理制度，採用潤利刺激，物質獎勵。布里茲涅夫也曾一再呼籲：『發展農業是全體人民的共同事業』。從一九六六年起蘇聯工業開始生產製造一百種新型農機，並且從一九六八年開始，一直到一九七〇年止差不多花了三年時間，才擬具了第九次的五年計劃——即一九七一——七五年的國民經濟計劃，把全部希望寄託在這次的新五年計劃上。這一次計劃的農業目標是每年平均穀物收穫量為一億九千五百萬噸，平均每公頃產量要提高到四公担，要為農業供應一百七十萬台的拖拉機，五十四萬架聯合收割機，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民生活水平，文化水平……等等。沒有那一次的五年計劃，不是冠冕堂皇，充滿着光明的遠景，這一次當然也不會例外。

從蘇聯農長易人說起

伍 蘇聯農業的現狀一般

蘇聯農業部主管的農產項目，除了穀物生產以外，還有工業原料作物，如棉花、籽棉、蔗糖、向日葵、馬鈴薯、蔬菜、牲畜、肉類、牛奶及奶酪製品、家禽及蛋類等，其中最主要的是穀物的收穫。自從一九七二年夏間就傳出歉收的報導，烏克蘭、白俄羅斯的收成，要比一九七一年度減少百分之十五，白俄羅斯的農業部長，因而屢遭抨擊。全蘇聯而言，預定穀物產量為一億九千五百萬噸，也不敷三千多萬噸左右，而急需向外購買者。

馬鈴薯原是俄羅斯人民僅次於麵包的主食品，由於肉類、魚類、牛奶、水果及蛋類供應缺乏，對於馬鈴薯的需要更為迫切。估計全國總產量中百分之四十至四十五係供人民食用，百分之二十五供作飼料。但是據有關方面報導，一九七二年度馬鈴薯產量，也比收成低劣的一九七一年度還少百分之十，其不足之數，正向波蘭採購中，為數達數百萬噸之多。至於肉類、家禽的供應，更是蘇聯農業部門中最落後的一環，飼料的栽培、種植均感不足，家畜產量，不敷需求，肉質低落，而售價又昂貴，政府方面也公開承認，關於這一部份，尚無法滿足人民的需要，廣大的消費者仍然沒有獲得適當的照顧，而絲毫不加掩飾。

蘇聯全國農業人口，約計四千萬人——佔全國勞動力三分之一。但是美國的農業人口只有三百五十萬人。

茲將歷年集體及國營農場數目消長比較如下：

年 度	集體農場	國營農場
一九二〇	?	四、九七二
一九二九	五七、〇〇〇	?
一九三〇	八五、九〇〇	?
一九三三	二二三、三〇〇	?
一九三七	二四三、七〇〇	?
一九三八	二四二、四〇〇	三、九六一
一九四〇	二二六、九〇〇	四、一五九
一九五〇	二四四、〇〇〇	四、五四〇
一九五三	九三、三〇〇	四、八五七

一九五四	九四、〇〇〇	四、七〇〇
一九五五	？	五、一七八
一九五八	六九、一〇〇	六、〇〇二
一九五九	五四、六〇〇	六、四九六
一九六〇	四四、九〇〇	七、三七五
一九六一	四一、三〇〇	八、二七〇
一九六八	三六、二〇〇	一三、四〇〇
一九七〇	三四、二〇〇	一四、三〇〇
一九七二(註二)	三二、八〇〇	一五、五〇〇

集體農場和國營農場本質上，經營方式上是完全不同的。前述兩種農場數字，逐年消長不同，歷年的參加農戶數目，農民數目，耕地面積，規模大小，農機設備……等，也隨時有所變更。上表顯示：集體農場數目，逐年減少，耕地面積逐年擴大；同樣相反的，國營農場數目，逐年增加，耕地面積，設備等也隨之增加。以一九七二年度的農場規模言，集體農場的平面面積為一萬五千方畝，國營農場則達五萬一千方畝。三十年代史達林厲行農業集體化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沒收和兼併私有土地，這個目標早已徹底完成，但是史達林把蘇聯集體農場當作統治農民的武器，控制人民的腸胃，局限人民的行動等另一種目標，依然是今天蘇聯共黨政權的一種統治形態。

陸 農業危機和糧荒的真正原因

蘇聯農業危機和穀物歉收，發生糧荒的現象和原因，是多方面和長期性的，不過，蘇聯當局經常總是把這些罪咎，一乾二淨的推到氣候上去，說什麼『如此複雜的氣候條件在整個一世紀中是從來沒有見過』啦，『嚴重的旱乾』啦，或者降雨量不足，下雪量不足啦，當然有時也承認一些組織上的缺點，農業幹部犯了嚴重的錯誤。由這一次農業部長的更替，牽動了最高階層的職務調整，固然足以顯示其危機的事態嚴重，但是如果認為其危機的來由，主要由於人謀不臧的話，那還是沒有把握癥結之所在，還沒有對症下藥。調換一些人員，仍然無法解決農業危機的。

蘇聯在地理上的偏枯性，大部土地位於高緯度或沙漠之區，土壤品質欠佳又處於邊緣氣候，愈北愈酷寒，夏季愈短，日照益缺，在此一地區耕種，冰凍是耕作物的危險勁敵，向南則愈接近大陸性氣候，乾燥而雨量少，甚至

還有沙漠熱風威脅，大旱歉收，更是常事。其他如農業科學和技術的比較落伍，排水或灌溉設備欠完善，施肥程度和土壤改良成果，農業投資，農業機械的供應，農村努力的供求，農業經營和管理的良窳，在在足以影響和決定其整個農業的豐歉和成敗。不過，俄共統治階層，他們總以為已經盡了最大努力，在這些方面，不斷從事改進中，通常難得坦白承認他們會有這些缺失的，不過有時候也透露一些真心話，像說蘇聯在農業法規上，其典型法規所最缺乏的，就是對集體農場農民的真正保護。蘇聯農業上，『有許多錯誤——缺乏經驗，純粹由於探索的錯誤』(註三)等等。其他如農業管理不科學，手續複雜，官僚制度，根深蒂固，理論重於實際，紙上談兵，農業宣傳品滿天飛，改進農業措施的公文電報、指示、命令等，源源而來，各種表報，日以繼夜也填寫不完而又是閉門造車的，但是農機農具損壞了，生鏽了，却經年累月擺在那裏，無人過問的事，則到處可見。

蘇聯和許多東歐共產國家，曾經流行過這麼一個笑話：

你們的農業危機，究竟有那些？

有四個。

——那四個？

——春季、夏季、秋季、冬季。

這和俄共宣傳家們經常詬病的資本主義經濟恐慌的週期性，又有什麼分別呢？

當然，此外，組織不健全，成本太高，缺乏工作紀律，缺乏創造性，缺乏物質獎勵和利潤刺激……等等，都可以說是它的原因之一。不過，最主要的，蘇聯農業，是可以反映蘇聯經濟全貌的一面鏡子，它的危機，落後，恐慌的根本源由，還是在『蘇維埃制度』，『社會主義體制』和『共產主義』。歸根到底，無論從理論也好，歷史也好，當前事實也好，都證實俄式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和貧窮、匱乏、饑餓、不幸、災難和奴役、罪惡……是結了不解之緣的，只要共產主義存在一天，那裏的人們，不但永遠得不到自由、幸福，而且永遠會生活在饑餓或饑餓的狀態中的。

註一：參見一九六四年三月七日真理報。

註二：參見香港工商日報一九七二年十月廿四第三頁。

註三：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廿六日真理報刊載之布里茲涅夫報告。